



唐代「大手筆」 作家研究

Research on
Tang "Dashoubi" Writers

曲景毅
著

五色石丛书
WUSESHI CONGSHU

文艺研究新视野



唐代「大手笔」 作家研究

Research on
Tang "Dashoubi" Writers

曲景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大手笔”作家研究/曲景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61-6454-9

I. ①唐… II. ①曲… III. ①应用文—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252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郑晓鸿

责任编辑 武兴芳

责任校对 王斐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346 千字

定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提起五色石，有谁不想到它源自中华民族借一位创世女神之巨手，谱写出的那篇天地大文章？一两千年前的汉晋古籍记载了这个东方民族的族源神话：当诸多部族驰骋开拓、兼并融合而造成天倾地裂，水灾火患不息的危难时刻，站出了一位曾经抁土造人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训》），重新恢复和创造天行惟健，地德载物的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在烈火中创造自己色彩的五色石，凝聚了这种天地创生，刚健浑厚的品格，自然也应该内化为以文学—文化学术创新为宗旨的本书系的精神内涵和色彩形态，探索一条有色彩的创新之路。

经由“天缺须补而可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缺者的大与圣，其补者的仁与智，无不引发创造精神和神思妙想的大爆发。何况人们又说女娲制作笙簧，希望在创造性的爆发中融入更多美妙动人的音符？李贺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歌咏的是西域乐器箜篌，朝鲜平民乐曲《箜篌引》，可见精神境界之开放，诚如清人所云：“本咏箜篌耳，忽然说到女娲、神姬，惊天入月，变眩百怪，不可方物，真是鬼神于文。”（黄周星《唐诗快》）创造性思维既可以正面立意，又可反向着墨，如司空图《杂言》：“乌飞飞，兔蹶蹶（乌与兔是日月之精），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当然也可以融合多端，开展综合创新，如卢仝的古体诗：“神农（应是伏羲）画八卦，凿破天心胸。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这就把伦常幽默、月宫神话，也交织到炼石补天的神思中了。更杰出的创造，是把炼

石补天神话的终点当作新起点的创造。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把女娲炼石补天时被弃置的一块顽石当作通灵宝石，带到人间走了阅尽繁华与悲凉的一遭，写成了“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天书”与“人书”相融合的精神启示录。由五色石引爆的这些奇正创新，综合创新和跨越式原始创新的丰富思路，应该成为我们书系的向导，引导我们进行根柢扎实，又五彩缤纷的学术探索，或如宋朝一位隐居黄山的诗人所云：“我有五色线，补袞袞可新；我有五色石，补天天可春。”（汪莘，《野趣亭》）

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世界视野空前开阔，创新欲望空前旺盛，学理思维空前活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思想学术文化已经以其无比丰厚的成绩走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我们也迎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扑面而来的机遇中的严峻挑战。高科技对文学生存方式的强势介入，市场机制对文学生产的批量性推动，消费时尚对文学潮流的极端吸引，以及网络、图像参与其间的新媒体文学表达形态，包括林林总总的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说文学等形态的火爆滋生，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今日之文学已远非昔日之文学了。对于原有的文学格局、形态和秩序而言，这里所面临的泛化性的消解和创新的包容的挑战，严峻地考验着当今学术界的学理担当能力。如果说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一些与女娲神话类似的“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危机，大概也不应被看作是危言耸听吧。那么，又从哪里找到补苍天的五色石，立四极的鳌足和止淫水的芦灰呢？若能够由此写出女娲炼石补天的新篇，也是本书系不胜翘首企盼的。

令人满怀信心的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百摧不磨，往往在艰难的挑战中出现超强度的爆发，在爆发中显示了坚毅的魄力和深厚的文化元气。浩瀚雄厚的多地域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实践，成为它层出不穷地为人类提供文化经验和创新智慧的不竭源泉。且不说旷世莫比的少数民族神话，即便中原神话虽未衍化为长篇英雄传奇，却散落为遍地开花的民俗奇观。五色石在历朝志怪和许多地理志中，屡有记载，女娲庙在甘肃秦州有，湖北房州也有。女娲抟土造人处据传在汉武帝《秋风辞》吟咏的汾阴，女娲墓则在九曲黄河最大的弯曲处古潼关附近的风陵渡，因

为女娲风姓，风陵也就成了娲皇陵了。中华民族是把自己的母亲河和这位创世女神连在一起的。五色石散落之处有广东产端砚的山溪，《元丰九域志》云：“端溪山有五色石，上多香草，俗谓之香山。”明代诗人说：“女娲炼馀五色石，藏在端溪成紫霞。天遣六丁神琢砚，梦中一笔夜生花。”（张昱，《题端古堂》）既然五色石散落岭南，那么炼石的灶口在哪里？在太行山。明人陆深《河汾燕闲录》说：“石炭即煤也……（山西）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今其遗灶在平定之东浮山。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五色石通过创世女神之手，成为一种天地交泰的文化生命结晶，它一头联结着赋予人类生存以温暖的“坚黑而光”的能源，另一头联结着文化创造的“梦笔生花”的灵性。在如此浩瀚无垠的天地、人类、历史、文化空间进行新世纪的文学学术创造，尽管阅尽风云变幻的价值重建、形式变换和文学边界模糊，但我们的民族也有足够的底气、智慧和能力，在文学研究中注入充满活力的人类审美本性的精髓，从中焕发出现代大国思想文化的独立品格和创新气象。

明诗有云：“五色石堪炼，吾将师女娲。”（周瑛，《至广德作东园书室》）是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调动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和创新智慧，拓展新视野，提出新命题，给出新阐释，师法女娲炼石补天的原始创新行为，炼造出一个东方现代大国的思想学术的五色石的时候了。

杨义

2008年6月1日

序 一

近年来，国内不少高校中文系研究古代文学的博士生常有找不到选题的苦恼。尤其唐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辉煌期以后，具有开拓性的选题越来越少，而研究者的队伍则越来越庞大。因此多数博士生的选题都难免依傍前人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前人已经开辟的课题里深刨细挖、拾遗补阙。曲景毅君的《唐代“大手笔”作家研究》却与此不同，虽然不能说是首次拈出“大手笔”的题目，但确实是找准了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块空白，其开创性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在本书开始撰写之前，学术界以“大手笔”为题的论文仅两篇，且仅限于“燕许”，主要是张说。而以张说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虽在 21 世纪近十年里开始陆续出现，但又并非都从“大手笔”的角度切入。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初盛唐诗歌革新的政治背景时，曾经提出张说和张九龄应是陈子昂之后对盛唐诗歌革新影响最直接的两位文宗。后来在 90 年代后期又再次联系盛唐文儒的问题，具体分析了张说在盛唐政坛和文坛上所起的作用，及其对盛唐一代文人思想和命运的影响。在写《唐宋散文》的时候，也注意到张说的文章在唐文发展中有一定地位。在多次接触张说的过程中，深感像这样的人物几乎不入文学史编写者的视野，是一种缺憾。这些年张说研究的增多，说明唐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在逐渐拓宽，只可惜有分量的论著还不多见，视线也没有越出张说以外。曲景毅君这本书，则是首次以整个唐代的“大手笔”作家为研究对象，较之以往单纯的张说研究，在选题上可说是一个大跨度的飞跃。为此，首先需要给“大手笔”做一个清晰的定义，并且确定究竟哪些人物可以算得上“大手笔”。本书综合史

料的记载，通过具体分析“大手笔”的语境，说明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变化，经过慎重的统计，最后确定了九位研究对象。同时作者也意识到，“大手笔”的选题，不可能仅限于文学，而是涉及文章学、文学史学、文体学、公文学等多种范畴，并且要求对唐代政治历史有相当的熟稔，研究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此本书的选题又充分体现了作者攻坚克难的学术勇气。

“大手笔”的提法，重点在“笔”，即应用文字。自从宋齐时代开始区分“文”和“笔”以后，二者的功能和性质之间的分界渐趋清晰，历来的研究文学史者也往往重“文”轻“笔”。近年来随着文章学研究的兴起，对非文学性文章的关注大大增多，但一般偏重于政治、思想、哲学等方面，应用性、礼仪性的公文往往被视为意义不大而忽略不提。“大手笔”的研究偏偏要面对许多在当时极为重要而在今天看似没有价值的官样文章，加上这类文章又多以典雅繁缛的骈文为主，既难读又难懂，如果没有极大的耐心，很容易伤了研究的胃口。本书作者令人钦佩的是，不但通读了这九位“大手笔”作家的全部文章，而且将每个人的写作特点归纳区分得十分清楚。例如指出李峤是一个谦辞卑语的行家里手，即使是典雅语汇的堆砌，也有不同的表现；又如在比较“燕许”的各类文体的基础上，抓住张说文章的散体化和苏頔文章杂用骚体及多用三字句的特点分别阐发，特别是对张说文章的文学性以及“卓犖入奇”的特点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从而突出了二位同样典丽富赡的“大手笔”写作风格的差异；又如指出常袞文章以简省实用、主旨鲜明见长，其制表文可视为元白制诏文的前奏，其墓志文则辞章华赡，富有感情，由此自然见出从“燕许”到常袞，文风从雍容典雅转向精到实用的变化脉络；对于李德裕的文章，作者从思考李德裕的公文制作与其精通《左传》《汉书》的关系出发，认为精熟《左传》，在李文中主要体现为尊王攘夷的思想，熟悉《汉书》，则反映在李德裕善用其中典故，以汉喻唐；由此引出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征引故事，以古治今，并且通过分析其使用不同类型的典故，得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行为的认识。李德裕还有相当一部分赋和史论、杂论，多为穷愁境遇中所作，最能表达其真实思想感情，已经不能视为公文制作。作者指出这些文章善于对历史人物提出新解和颠覆、多影射时事，立论精深、言

辞峻洁，与早年奏疏、箴文截然不同。最后以“雄且奇，简且精，骈亦散，典而畅”十二字概括了李德裕文章四方面的特色。这些分析各有其精心选择的角度，不但贴合每位“大手笔”作家的主要特征，而且反映出唐代应用文制作从初盛到中晚几个重要阶段的不同风貌，形成了清晰的历史脉络。

“大手笔”作家在唐代文人心目中是人生的楷模，所谓“润色鸿业”，不仅仅是颂体文章的功能，也是多少文人渴望实现的人生最高理想。所以研究“大手笔”作家的意义不仅在他们制作的应用文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功业对唐代文人的影响，乃至与唐代政坛及文坛发展的关系。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唐代每一次思想秩序的重建与复振都与“大手笔”作家的政治与文学活动密切相关”。基于这一认识，本书的第五章对整个选题的观点有了一个重要的提升，因而成为全书最精彩、最有问题意识的部分。这一章提出了好几个问题。一是“大手笔”作家与唐代儒学的演进；二是与唐代骈体文发展的关系；三是“大手笔”作家的文学活动对文坛的影响；四是他们通过奖掖、评议、交游对一般唐代文人的影响；作者在这几方面都有其独到的创获，例如对于张说大力提倡礼乐与文学的关系，有一段精到的总结：“作为盛唐一代文儒，张说深深地浸润于时代风气之中，然又能审时度势，把握现实政治和社会态势的走向，努力立足于当代来解决问题。他既不赞同以儒学取代文学，也不取后来沉湎于诗艺锻造而遗失儒道本旨的做法。而是在最贴近盛唐理解的天人关系的理性基础上，使其礼乐观念深入人心，找到了儒学和文学的契合点。为传统的诗教观注入了相融于时代的新内涵，也为他们的志趣、行为、立身方式乃至社会地位作出了定位和诠释。”又如关于中唐儒学的转变，历来文学史家较多注目于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到韩愈、柳宗元这些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对儒学内涵的重新思考。前些年有学者注意到春秋学在中唐学术中的作用，开出了新的思路；本书作者从常袞、李吉甫、李德裕等“大手笔”作家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儒学实用功能的重视，及其促使儒学向儒术转换的作用，这就为认识中唐思潮变化的广阔背景又增加了一个视角。又如考察奉和应制和宫廷文会对唐代文坛的影响，这虽然是初唐文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角度，但是本书强调了“大手笔”作家在这类活动中的核

心作用，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便更深入。

第五章最后一节“大手笔”作家的后世接受和声名消解，是作者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有趣问题。作者采用几种后世的唐文选本，通过统计方法来证明这些作家的声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同时分析了他们被历史遮蔽的几种原因，都是切合事实的。由此更引出一个值得当今文学史研究者深思的问题：“文学史的编撰是根据现代的文学观念来梳理历史上的文学，还是应复归每个历史阶段的文学观念和历史真相去书写？”这也正是这部著作的研究路数给我们留下的思考。但我以为“原生态”研究和当代思考并不是具有选择性的、非此即彼的两个对立的方向，辩证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更能考验研究者的功力和学识。其实，本书第五章提出的问题以及前三章里穿插的几个问题，例如对“文章四友”的辨析；对前人“唐文三变”说的阐发；关于“大手笔”作家的修史经历与其文笔的关系等，都体现了作者在恢复“原生态”的同时融入当代思考的努力。

曲景毅君在攻读博士期间，由程郁缀先生指导；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也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毕业后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任教，近几年常在海内外的学术会议上遇见。得知他已经发表了好几篇与本选题有关的论文，并且受到同行学者的关注。最近他将博士论文修订为一部煌煌三十万字的大著，并且即将出版，因嘱我为序。重读其全部书稿之后，发现经过几年的打磨和深入思考，原来的论文已经提升为一部论述严密、结构完整的佳作。欣喜之余，遂写下几点感想，不足以概括其全部创获，仅借此略表祝贺之意而已。

葛晓音

2014年金秋于北京

序 二

认识景毅先生多年，知道他精敏好学，勤奋自励。在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汉魏六朝文学、唐宋文学，且长期关注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发表多篇著作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而今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的他，既能贡献所学，复能弘扬中华文化，允为当前中生代后起之秀，卓然有成，指日可待。

研读传统中华文化，从作家生平入手，了解时代背景对作者产生的影响，所谓“知人论世”的工夫，实为不可或缺的法门。关于唐代文学的研究，学者也大多由作家个案研究入手，而关于唐代应用文书方面，自然就集中在号称“大手笔”的张说一人身上了。早期，王毓秀《张说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0年）、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二书，大致先从编纂年谱工作开始，筚路蓝缕，嘉惠后学不少。时至今日，这种传统文学批评法仍然可以有些研究成绩的原因，一是因为选题个案为前人所不曾注意，二是新出土材料可以提出新视野，三是已有多位学者从事诗文集校注、作家资料汇编、断代学术史编年的工作，更加提供了便利的缘故。

唐代被史书或时人称作“大手笔”作家者有十六人，本书专注探讨了颜师古、岑文本、崔融、李峤、张说、苏頲、常袞、李吉甫、李德裕等九人，兼及其他；对于他们如何应得“大手笔”的名声，生前享有荣耀，对当代文坛的领导作用，作了很深入的个案分析。其中多数作家，没有文集单行本传世，《中国文学史》之类的书籍介绍不多，学界对他们的认知有限，这类“作家研究”的成果，后来依旧集中在官位较高、影响力较大的

张说、苏頔、李德裕三人身上。此书首先能掘发人才，发潜德之幽光；其次能搜罗文本，引用学者们罕用的古籍，填补晚近出土的材料，甚至对于新出版的《全唐文补编》之类书籍，引用时重新校订，句读略有修改，这种考辨严谨的工夫，使得全书论述有据，具有学术参考价值，有功于士林。

从“作家研究”走入“文本研究”，才是文学研究的重心。可惜的是，过去学界往往重视纯文学而不重视实用文学，忽视了传统中国文学重视社会功能的实用价值。殊不知唐代号称“大手笔”的作家，承袭汉、魏、六朝以来的文学体裁，书写许多行政文书和应用文字，如诏令、奏策、檄、序、碑志、行状等，对当代文坛有巨大的影响力。只要考察刘勰《文心雕龙》讨论的各类文体，与中唐韩愈、柳宗元以下古文家的文学体裁有何不同，就可以发觉唐代“大手笔”作家群其实是获得前代文学传统雨露沾溉的重要作家。后世学者往往受限于后世的语境，忽视了前代作家继承传统又有所创新的努力过程，譬如《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所说：“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頔着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朱熹看见后来唐宋古文运动的成功，于是将苏頔视为不成功的人物，忽视了他在当时有很好的叙事文本、议论文章的重要性。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反思：倘若没有苏頔等人的文学成就，是否会有中唐韩愈古文大作家的出现？后世学者往往认定古文是为了打倒时文（其实时文很多就是唐代“大手笔”所写的应用文书）而兴起，却忽视了没有流行的时文，那么古文的写作基础是否足够？当我们发觉韩愈应试之前写时文，欧阳修学写古文之前也写西昆体诗文，难道这些对他们的古文写作没有帮助吗？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自序》云：“中国文章中极侈丽者，有四六文。欲知四六文，必解一般骈文；欲知一般骈文，必解汉赋；欲知汉赋，必解楚骚；此其为一贯系统。摘出其一，则不免支离矣。”铃木先生是从辞赋的立场作说明，其实文体发展的原理是相通的，研究唐宋古文者，不也应该了解时文吗？否则古文为何饱含儒家思想，写下许多实用文章，而没有跳接魏晋六朝主张的纯文学道路呢？众人习焉不察，忽略了文学发展是一个滚动的轨迹，不论是作家个人的书写，或是时代文风的转换，都是反复滚动式的学习过程及其成

果的展示。

从上述的讨论看来，作者似乎还有一个企图心，想从“文本研究”走入“文学史研究”。我们不妨先提出一个问题：学界往往重视衰世文学而不重视盛世文学，这点似乎与韩愈“不平则鸣”说、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说相唱和，亦如《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所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这类说法，视“文学为苦闷的象征”，已经根深蒂固，深植人心，间接地造成初唐、盛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乏人问津，历时好久了。不过，本书在前四章讨论个别作家之后，第五章进行作家综论研究，探讨他们在儒学嬗变、文风演进的转换过程中的交互作用，指出“大手笔”作家都是儒家思想的实践者，带有浓厚的讽谏劝诫意识，对于梁肃以来提出的“唐文三变”说又适度地作了厘清。作者说道：“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从总体趋势来看是自身不断否定的相对独立过程，是文与质、骈与散的否定与统一。由简到繁，由骈趋散，由质而无文，到文质彬彬，再到以质朴为主。这一点从整个古代应用文写作的发展和唐代应用文写作的发展都可以得到证明。”这让我们更明白唐代文章分期与转换的关键因素，由此得知初、盛、中、晚唐每一个阶段的作家都是文学的推手，“大手笔”作家更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后续发展。

这本书从“作家研究”走入“文本研究”，再走入“文学史研究”，涉及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其中提出唐代重要文本的解读与诠释，对于了解唐代应用文的写作极有帮助，为还原唐代文学的真实面目作出实质的贡献。经由作者的用心经营，让我们看到唐代文学不同阶段的风貌，深具启发性，值得再三捧读品味。

王基倫

谨志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2014 年 12 月 10 日

目 录

序一	葛晓音(1)
序二	王基伦(5)
绪论	(1)
一 唐前应用文的发展流变与唐代杂文学观	(1)
二 “大手笔”溯源、含义及其衍变	(6)
三 唐代“大手笔”作家及本书的研究对象	(11)
四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与本书的创新点	(20)
第一章 绮靡骈俪文风的百年徘徊:从颜岑至崔李	(24)
第一节 开国“大手笔”作家	(25)
一 陈隋遗彦,徐庾旧体:颜、岑的骈俪文风	(28)
二 颜、岑熟稔典章的奏议与忠贞体国的谏疏	(31)
第二节 武周升平的颂歌与变本加厉的绮靡	(34)
一 雅颂之盛与李峤、崔融的词臣面貌	(34)
二 “润色太平”的颂体表文	(38)
三 “才章富健”的功德碑与“用思精苦”的哀册文	(49)
四 绮靡颂歌之外:李峤、崔融的实事奏议	(59)
五 从崔李文章看“文章四友”之含义及位次	(64)
第二章 盛世气象:张说与苏颋	(70)
第一节 “燕、许大手笔”	(70)

一	从“燕、许大手笔”到“燕许体”文·····	(70)
二	“纪述事业,润色王道”·····	(73)
三	“崇雅黜浮,气益雄浑”·····	(84)
四	“骈俪犹存,波澜渐畅”——“燕许”在唐文发展史上的过渡与革新 ·····	(89)
第二节 张说、苏颋之比较·····		(92)
一	文体差异——制敕与碑志·····	(92)
二	散体化与骚体、“三字句”·····	(101)
三	“唐骈文之盛轨”——张说的卓犖入奇及其文学特质·····	(105)
第三章 走向经世致用:常袞与李吉甫·····		(117)
第一节 安史乱后的中兴梦与经世致用风气的形成·····		(117)
第二节 “文采赡蔚,长于应用”的常袞·····		(121)
一	岑寂的大历文坛与常袞的应用文写作·····	(121)
二	制书的文献价值与认识价值·····	(125)
三	新“文儒”的转型·····	(132)
四	制诏新体的前奏·····	(139)
五	墓志文的新变·····	(146)
六	研究常袞的意义·····	(154)
第三节 “竭心膂以振皇纲”之李吉甫及其他·····		(155)
一	李吉甫的经世用心与其应用文写作·····	(155)
二	唐代“大手笔”作家特例·····	(163)
第四章 李德裕以文章治天下·····		(167)
第一节 讨胡平叛之中兴实录——李德裕的文章之功·····		(169)
一	以文章德绥北狄·····	(169)
二	以文章智平泽潞·····	(172)
第二节 李德裕的公文制作与《左传》《汉书》之关系·····		(174)
一	尊王攘夷,“深全国体”·····	(175)
二	以汉史为纲,典实“衮衮”·····	(178)

三 征引“故事”，“援古为质”	(182)
第三节 李德裕制诏奏议之风貌	(186)
一 气象雄毅，“英雄本色”	(186)
二 “简严中能尽事理”	(190)
三 “明白晓畅”，辞情兼备	(196)
第四节 李德裕的“论”体文	(199)
一 论体溯源与李德裕文章的议论性	(199)
二 “精深峻洁，有为而发”的“论”体文	(208)
第五章 唐代“大手笔”作家综论	(223)
第一节 唐代“大手笔”作家与儒学、文风的演进、转换	(223)
一 “大手笔”作家与唐代儒学的三次复振	(223)
二 “大手笔”作家与唐代文风的转换	(240)
第二节 “大手笔”作家对唐代文坛的影响	(248)
一 奉和应制与宫廷文会	(248)
二 奖掖、交游与评议	(264)
第三节 唐代“大手笔”作家之后世接受与声名消解	(288)
一 宋、明、清三代唐文选本与“大手笔”作家	(291)
二 声名消解与历史遮蔽	(299)
结论	(307)
主要参考文献	(311)
附录 唐代“大手笔”作家现存文章著录汇考	(318)
本书相关论文发表一览	(331)
后记	(333)

绪 论

一 唐前应用文的发展流变与唐代杂文学观

中国文学向以诗文比肩并立，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相对而言，在古代，文章可能比诗歌更为重要，与文人的命运关系也更为密切，一部中国文学史，讲述文章的比重应该占据更为突出的地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下流行的文学史往往以诗歌为中心进行结撰^①，忽略了文章数量宏富这一事实，许多富有审美价值的文章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大量应用性的文章更是被完全排除在文学史的视域之外^②，这是不符合文学发展的事实的。

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家以实用为指归，故而中国文学两千多年的发展是以实用为主的传统。孔子称《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观”与“群”即反映了一种实用的政教功用。刘勰《文心雕龙》与萧统编《文选》将文体划为 20 类或 38 类，除诗赋、乐府外，几乎均为应用文体，至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亦复如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许多作家均因擅长撰写文章（特别是应用文写作）而受到特别的推崇，他们将实用性题材写得文情并茂，气韵生动，这是与现代国家的政

① 这恐怕是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认为：“西方文艺理论常识输入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一律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文学创作精华的同义词。”（《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4—5 页）

② 如四川大学曾枣庄《从文章辨体看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围》（《文学遗产》1988 年第 4 期）一文即认为从汉魏到唐五代时“诗文各体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别集中那些经论、书信、奏议、诏令性文字不属于古典文学的研究范围。